

香港中小學生國家認同實證研究

李臣之, 郑 涵, 梁舒婷, 黄晶榕

摘要:通过对1239名香港中小學生调查发现,香港中小學生國家認同水平相较于之前的同类研究有所提高,但是,在“个体价值”的认识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部分學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身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价值或共享感的主观认知明显不足;香港中小學生國家認同在年级、母亲国籍、曾就读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香港中小學生的國家認同在7个维度呈正相关。依据调查结果,建议鼓励香港中小學生到内地研学实践,或到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子弟校或子弟班就读,重点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融入祖国发展大局,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潮流,以提升香港學生参与祖国建设的意识和自信;加强香港教师爱国主义教育培训,聚焦國家認同教育目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铸牢學生的政治思想基础;发挥母亲在國家認同教育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家校协同,优化國家認同教育的家庭环境,系统提升學生國家認同水平。

关键词:國家認同;香港中小學生;粤港澳大湾区;家校协同

中图分类号:G31;G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3)09-0030-10

一、问题提出

國家認同,是指一个國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國的历史文化传统、國家主权、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等的認同,其本质是个体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國家,形成捍卫國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1]人们只有了解自己的國民身份,认识到自己与國家的密切联系,将自我归属于國家,才会自觉关心國家,捍卫國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港澳回归祖國后,港澳同胞的國家認同状况一直是國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为推动香港积极融入國家发展大局、增强香港青少年对祖國的向心力,党和国家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重大政策和措施。2020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国安法”明确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2]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显著进展,香港特区政府通过惩处乱港分子、改革课程、清理内容不当的教材等措施,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2019年度国家一般课题“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國家認同教育课程协同共生研究”(BHA190130)。

作者简介:李臣之,深圳大学湾区教材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深圳 518060);郑涵,深圳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深圳 518060);梁舒婷,深圳市海乐实验学校教师,教育学硕士(深圳 518060);黄晶榕,香港创知中学校长、博士(香港 999077)。

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不断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爱国精神，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3]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建设为促进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提供了重要契机，越来越多的港人子弟到内地游学、参观、就读，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和社会现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的现状如何？有何变化？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和接纳自己的国家？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加强香港中小学生的国民教育、提升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鉴于此，本研究整合相关研究工具，自编量表考察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及关键影响因素，为香港中小学生的国民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针对性建议，助力香港中小学深度推进国家认同教育。

二、文献综述

（一）香港地区国家认同水平调查

当前，针对香港地区国家认同的实证调查并不多，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视角，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香港公民的国家认同状况存在不同特点和差异。涂敏霞等人针对14—30岁香港青少年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水平并不高，爱国程度平均分为2.64（以1—5分测量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程度），部分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分值明显偏低，且香港青少年中真正的完全没有国家认同的群体呈现低龄化、扩大化和非理性化的趋向。^[4]沈本秋援引香港亚太研究所的追踪调查数据指出，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一直没有大幅提升，受殖民统治和制度短缺的影响，香港人的国家认同进展十分缓慢。^[5]郝诗楠基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所做的“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系列民意调查结果指出，回归以来，香港人受访

者对政权意义上的“中国标记”抗拒的程度要高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标记”。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在公民身份或政权意义上“中国人”认同的模糊性已经逐渐开始反过来影响许多香港人对于文化意义上“中国人”的认同。^[6]凯文（Kevin）等人通过调查发现，香港年青一代与老一辈的身份认同存在显著差异，80后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7]与上述相对悲观的调查结果不同，一些学者对香港公民的国家认同水平表现出一种谨慎乐观的判断。例如，郭艳和徐博东通过对比1997年和2005年有关的民意调查数据后发现，回归后香港同胞的“中国人”意识在逐渐增长，单一的香港人身份认同大为减少。^[8]又如，郑宏泰和尹宝珊就香港政改问题进行全港性随机抽样民调^①，调查表明，大多数民众都认同政改方案应遵守“基本法”以及全国人大的相关决定，对于激进民主政团的支持度只维持在数个百分点的水平，因此，郑宏泰和尹宝珊认为，尽管香港人仅维持三成水平的“中国人”认同，但不能因此判定香港“本土主义兴起”以及出现强大的分离主义行动。^[9]

既有的相关实证研究通过问卷测评香港公民的国家认同现状，为国家认同教育评估和反思提供了参考借鉴。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大部分实证研究主要是借用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和香港青年联合会等研究机构的二手调查数据，这些二手数据采集的时间段大多集中于2013年之前，数据年代久远，不能确切反映当前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真实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工具相对简单，没有形成独立且自成体系的问卷结构，且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成人群体，香港青少年群体国家认同实证调查明显不足。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和接纳自己的国家？他们更加认同国家的哪些方面？这些问题亟待深究。

（二）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香港公民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有

^① 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一般简称政治改革或政改，通常指香港主权移交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而制定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及其发展改革。

学者从单一角度深刻剖析某一因素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作用机理。例如,符可莹(Ho-Ying Fu)等研究者通过比较香港殖民时期与回归后两种教育文化以及教育环境与其国家认同的相关分析来测量社会环境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10];洪英怡运用实验法、访谈法检验香港青年对内地的态度、内隐信念和认知等个体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11];弗朗西斯(Francis)指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看法,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香港年轻人不单纯满足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他们强调自我价值,崇尚自我解放,更加关注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对国家的期望呈现出“后物质”取向^[12];张萌萌则发现媒体是影响香港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面对各种媒体化的身份认同。^[13]除此之外,有学者则立足内地与香港有关的历史和发展,追溯影响香港人国家认同的诸多历史性和现实性因素。比如,康玉梅运用历史分析法梳理香港在回归祖国前的学校教育发展历程,结果发现,尽管学校教导香港青年仍然是中国人,但本地学校教育中的政治和民族主义真空最终导致的是疏离内地现实的抽象中国道德文化意义上的认同。^[14]郑宏泰和尹宝珊则关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流动性等因素对香港公民国家认同的深刻影响。^[9]也有学者重点关注国家认同缺失对于香港民主化进程、香港青年自我发展等产生的负面影响。^[15]

通过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针对香港公民国家认同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但在影响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状况的诸多原因中,哪些是造成他们国家认同缺失的主要因素?不同香港青少年群体,如曾在内地就读和一直在香港就读的青少年,二者国家认同状况有何差别?有必要深入考察。

三、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整群抽样的方式对香港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发放提供线上问卷星、线下纸质版两种方式,由参与调查学校

自由选择。最终回收问卷 1598 份,删除含有缺失值、所有量表题选择选项一致、学生为非中国籍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1253 份,有效问卷率 78.41%。调查对象中男生 650 人,女生 603 人;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各年级人数分别是 170 人、163 人、213 人、284 人、233 人、190 人;中国籍学生人数 919 人,其父亲为中国籍的学生 1228 人,非中国籍 25 人;其母亲为中国籍的学生 1232 人,非中国籍的 21 人,其中父母亲均为中国籍的学生 1210 人,父母亲有一方为非中国籍的学生 22 人,父母亲均非中国籍的 3 人;曾在中国内地读书的学生 135 人,一直在香港读书的学生 1112 人,曾在澳门读书的学生 2 人,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读书的学生 4 人;父亲、母亲“没上过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 22 人和 14 人,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 72 人和 109 人,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学生人数分别为 318 人和 330 人,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学生人数分别为 574 人和 538 人,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的学生人数分别为 223 人和 231 人,父亲、母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的学生人数分别为 44 人和 31 人。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李臣之等编制的《中小学生国家认同量表》(以下简称“国家认同量表”),对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调查。问卷样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国籍、父母亲国籍、曾就读地、父母亲文化程度;国家认同问卷主体包括个体价值(5个题项)、公共集体自尊(5个题项)、国家归属(6个题项)、互依信念(4个题项)、国家倾向(5个题项)、外显行为(3个题项)、内隐行为(4个题项)。“个体价值”指个体对所属国家的价值或者贡献感的主观认识;“公共集体自尊”指个体关于其他国家成员如何评价所属国成员的认知;“国家归属”指个体对国家的情感卷入和依恋程度;“互依信念”指在他人存在的语境下,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和所属国及其成员休戚相关,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情感依恋程度;“国家倾向”指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个体倾向于无条件支持所属国家的偏爱程度;“外显行为”指个体通过实际行动直接参与同所属国家相关活

动的积极程度；“内隐行为”指个体通过内在行为寻求与所属国家相关的信息，以及产生与所属国家相关思想活动的积极程度。国家认同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计分，评价等级分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分别以“1、2、3、4、5”计分，分数越高，代表香港学生国家认同越高。研究数据采用 SPSS26.0 和 AMOS25.0 软件处理。

（三）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对 1253 份有效样本进行信度检测，国家认同量表各因子信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7 个因子克隆巴赫 α 系数处于 [0.740, 0.945] 区间，信度达到“高”至“非常好”水平，国家认同量表总信度 $0.97 > 0.9$ ，信度非常理想。^[16] 总量表 KMO 值为 0.979，Bartlett's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 34722.445 ($p < 0.001$)，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萃取法固定提取 7 个因子，使用 Promax 斜交旋转法转轴，所得因子载荷量均大于 0.71，因素负荷量状况理想^[16]，特征值在 1.979—4.720，方差累计贡献率为 75.94%，问卷总体效度良好。

表 1 国家认同量表各因子信效度分析结果

因子	题项	克隆巴赫 α 系数	因子载 荷量	特征值
国家归属	6	0.945	0.860—0.916	4.720
公共集体自尊	5	0.904	0.825—0.882	3.613
国家倾向	5	0.906	0.814—0.896	3.648
个体价值	5	0.783	0.825—0.883	2.993
内隐行为	4	0.880	0.837—0.901	2.952
互依信念	4	0.920	0.889—0.905	3.229
外显行为	3	0.740	0.801—0.833	1.979
总量表	32	0.97	—	23.134

（四）正式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

从 1253 份有效样本抽取 500 份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温忠麟等人建议的模型拟合指标和适配临界值，抽取 AMOS 部分指标（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结果进行整理（见表 2）。结果显示，国家认同量表的 TLI 值 = $0.892 < 0.9$ ，但与临界值相差不大，可考虑结合 CFI 值来判断（温涵、梁韵斯，2015）。CFI 值 = $0.903 > 0.9$ ，故模型适配度良好，因此，可认定国家认同量表结构合理。

表 2 调查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标

	χ^2	df	χ^2/df	RMSEA	TLI	CFI	IFI
适配的临界值	—	—	< 5 (合理)	< 0.08 (合理)	> 0.9	> 0.9	> 0.9
国家认同量表	1642.628	447	3.675	0.073	0.892	0.903	0.903

四、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现状分析

（一）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总体情况的描述分析

为了能更直观地反映调查结果，将问卷的实际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求出实际得分与总分占比关系，即“达到理想状态的百分比”（题目平均分为“3”时，该变量得分刚好达到理想状态的 50%）。调查结果显示（见下页表 3），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平均得分 116.26（标准差 26.581），题目平均值得分 3.63，达到理想状态的 65.75%。在国家认同的 7 个因子中，“国家归属”题目平均值得分最高，为 4.05，达到理想状态的 76.25%；“个体价值”题目平均值得

分最低，为 3.29，达到理想状态的 57.25%。7 个因子中，题目平均值得分最高的 3 个因子依次是“国家归属”“国家倾向”“内隐行为”，它们达到理想状态的百分比均高于总问卷的平均水平，其中，“国家归属”“国家倾向”因子属于情感层面，这说明香港中小學生对祖国的情感卷入程度较高，在与其他国家做比较时，大多数学生倾向于无条件支持中国；题目平均值得分最低的“个体价值”属于认知层面，未达到理想状态的 60%，这说明香港中小學生对所属国家的价值或者贡献感的主观认识明显不足。

由下页表 3 可见，除了“个体价值”，国家认同及其他变量的中位数均高于平均值，这说明

香港大多数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高于平均水平，但国家认同偏低的极端值多于偏高的极端值。总

的来看，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整体水平中等，且存在一部分学生国家认同明显偏低的情况。

表 3 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因子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题目平均值	达到理想状态的百分比/%
国家认同	116.26	26.581	119.00	3.63	65.75
个体价值	16.44	4.452	16.00	3.29	57.25
公共集体自尊	17.70	4.456	18.00	3.54	63.50
国家归属	24.32	5.799	26.00	4.05	76.25
互依信念	13.94	4.461	14.00	3.48	62.00
国家倾向	18.63	4.922	19.00	3.73	68.25
外显行为	10.71	2.890	11.00	3.57	64.25
内隐行为	14.54	4.015	15.00	3.63	65.75

(二) 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检验

本研究提取“性别”“父母亲国籍”属性从不同维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及独立样本 T 检验，提取“年级”“曾就读地”“母亲文化程度”等维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检验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1. 性别、母亲国籍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本研究提取“性别”“母亲国籍”属性从不同维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及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香港中小学生国家认同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同性别的香港中小学生在“公共集体自尊”“外显行为”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01$)，女生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 (均值为 16.47, 10.99) 均略高于男生 (均值为 10.45, 16.40)。国家认同感及其 7 个因子在父亲国籍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除了“个体价值”，国家认同感及其 6 个因子均在母亲国籍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事后比较结果显示：母亲国籍为中国的学生的国家认同感 (116.53) 显著高于母亲非中国籍的学生 (100.62)。

2. 年级、曾就读地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第一，年级。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国家认同及其 7 个因子上差异显著 ($p < 0.05$)。事后比较结果显示：五年级学生 (123.44)、六年级学生

(122.92) 的国家认同感显著高于初一学生 (115.69)、初二学生 (108.99)、初三学生 (107.16)；四年级学生 (122.10) 显著高于初二学生 (108.99)、初三学生 (107.16)。

第二，曾就读地。国家认同及其 7 个因子均在曾就读地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事后比较结果显示：曾就读于中国内地的学生 (127.13) 的国家认同感显著高于一直就读于香港本地的学生 (114.87)；曾就读于中国内地的学生的个体价值、公共集体自尊、国家归属、互依信念、国家倾向、外显行为、内隐行为 (均值分别为 17.33, 18.70, 26.77, 15.88, 20.47, 11.90, 16.09) 显著高于一直就读于香港本地的学生 (均值分别为 16.33, 17.57, 24.01, 13.69, 18.39, 10.55, 14.33)。

3. 母亲文化程度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国家认同及其 7 个因子在父亲文化程度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母亲文化水平在个体价值、国家归属、互依信念、国家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事后检验结果显示：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的学生的个体价值、国家归属、互依信念、国家倾向 (均值分别为 17.27, 25.11, 14.49, 19.39) 高于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学生 (均值分别为 16.13, 23.67, 13.45, 18.13)。

表 4 国家认同及其 7 个因子的差异检验统计

因子	人口学变量	t 值/F 检验	事后比较结果
国家认同	年级 (T)	15.510***	五、六 > 初一、初二、初三 四 > 初二、初三
	母亲国籍	2.726**	中国籍 > 非中国籍
	曾就读地 (T)	9.214**	内地 > 香港

续表

因子	人口学变量	t 值/F 检验	事后比较结果
个体价值	年级 (S)	13.287***	四、五、六>初二、初三
	曾就读地 (S)	3.068*	内地>香港
	母亲文化水平 (S)	2.752*	大学>高中
公共集体自尊	性别	-2.665**	女>男
	年级 (S)	5.026***	五>初二、初三
	母亲国籍	2.507*	中国籍>非中国籍
	曾就读地 (S)	4.132*	内地>香港
国家归属	年级 (T)	15.266***	四、五、六、初一>初二、初三
	母亲国籍	2.168*	中国籍>非中国籍
	曾就读地 (T)	14.252***	内地>香港
	母亲文化水平 (T)	3.179**	大学>高中
互依信念	年级 (S)	10.186***	四、五、六>初一、初二 四>初三
	母亲国籍	2.059*	中国籍>非中国籍
	曾就读地 (T)	16.233***	内地>香港
	母亲文化水平 (H)	3.278**	大学>高中
国家倾向	年级 (S)	15.081***	四、五、六>初二、初三 五>初一>初三
	母亲国籍	2.876*	中国籍>非中国籍
	曾就读地 (S)	11.077***	内地>香港
	母亲文化水平 (S)	4.162**	大学>高中
外显行为	性别	-3.326**	女>男
	年级 (S)	11.380***	五、六>初一、初二、初三 四>初二、初三
	母亲国籍	2.891**	中国籍>非中国籍
	曾就读地 (T)	14.190***	内地>香港
内隐行为	年级 (S)	12.786***	四、五、六>初二、初三 六>初一
	母亲国籍	2.046*	中国籍>非中国籍
	曾就读地 (T)	13.631***	内地>香港

* P<0.05 ** P<0.01 *** P<0.001

注：“S”和“H”在方差同质时使用，前者为 Scheffe 检验法，后者为 Tukey HSD 检验法，当“S”比较结果不显著时改用“H”检验法进行事后比较。方差异质时，使用“T”，即 Tamhane's T2 检验法进行事后比较。

(三) 国家认同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为了解国家认同各维度的相互关系，本研究采用皮尔逊 (Pearson) 相关检验进行操作，结果如下页表 5 所示。

从表 5 中很容易发现，国家认同与个体价值、公共集体自尊、国家归属、互依信念、国家倾向、外显行为、内隐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 ($p<0.01$)，

相关系数介于 0.743—0.921，呈高度相关。其中，国家倾向与国家认同的相关系数为 0.921，这说明二者相关度最高。也就是说，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香港中小學生倾向于无条件支持所属国家的偏爱程度越高，其国家认同得分也越高。公共集体自尊与国家认同的相关系数为 0.743，说明公共集体自尊与国家认同相关度最低。

表5 国家认同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因子	国家认同	个体价值	公共集体自尊	国家归属	互依信念	国家倾向	外显行为	内隐行为
国家认同	1							
个体价值	.779**	1						
公共集体自尊	.743**	.509**	1					
国家归属	.919**	.643**	.626**	1				
互依信念	.888**	.627**	.535**	.783**	1			
国家倾向	.921**	.663**	.615**	.852**	.810**	1		
外显行为	.843**	.590**	.632**	.731**	.719**	.746**	1	
内隐行为	.884**	.620**	.537**	.791**	.836**	.786**	.740**	1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与讨论

第一, 将本研究与之前的同类研究相比可以看出, 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水平有所提高, 但在个体价值的认识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本研究调查发现, 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感均分为 3.63, 而涂敏霞等人在 2014 年围绕港澳青少年国家认同的调查指出, 香港青少年的爱国程度平均分为 2.64。^[4] 与 2014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 当前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水平有所提高, 但在国家认同各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来看, 香港中小學生在个体价值方面得分最低, 认知层面个体价值、公共集体自尊两个因子、情感层面的互依信念、行为层面的外显行为, 均低于总问卷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 香港中小學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身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 不能很好地感知自己之于祖国的价值; 香港中小學生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评价并不太积极, 立场中立; 对自己和祖国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情感依赖程度不高; 尽管香港中小學生会主动思考与祖国相关的事情, 但通过实际行动直接参与同祖国相关活动的积极性不高。这些情况从侧面反映出香港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效果仍然有待提高。长期以来, 香港中小学国家认同教育面临诸多阻碍。一方面, 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 香港社会始终存在一种固守意识形态、不愿适应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社会心理。^[17] 部分港人对“一国之大同”避而不谈, 只强调“两制之大异”。在这种社会心理下, 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教育总是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另一方面, 从学校教育系统内部来看, 由于缺乏独立的课程支援和资源投入, 香港国家认同

教育的内容十分零散。虽然常识科、中国历史科等科目确实含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等内容, 但在实际教学中, 这些内容经常是被蜻蜓点水地讲授甚至直接略过, 由于课时限制, 不少学校难以抽出时间讲授基本法。^[18] 另外, 在香港, 德育课程备受冷落, 香港中小學生不能系统了解祖国的基本制度和主要的方针政策, 不能很好地感知自我与祖国的密切关系, 对祖国的价值倾向、情感确认、行为投入程度都有待提高。

第二, 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在年级、母亲国籍、曾就读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调查发现, 大多数香港中小學生的国家认同高于平均水平, 但国家认同偏低的极端值多于国家认同偏高的极端值, 这说明香港确实有一部分学生的国家认同明显偏低。从差异分析的结果来看, 香港中小學生国家认同在年级、母亲国籍、曾就读地方面的差异显著, 其中, 年级、曾就读地变量对国家认同产生的影响达到中等程度, 假定把香港中学生和小学生分别分为曾在中国内地就读组和曾在中国内地以外就读组, 那么曾就读于中国内地的小学生是这四组学生中国家认同最高的群体。和一直就读于香港的学生相比, 曾就读于内地的小学生对内地经济发展、传统文化、节日风俗等的认识和体会更深, 国家认同程度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 香港小学生国家认同程度高于初中生的结论与李臣之等人调查澳门中小學生国家认同时得出的结论一致^[19], 这可能与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及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关。已有研究表明, 小学低年级学生年龄小、思想不成熟、对待周围事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认识, 此时教师在课堂上的示范引导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 而小学高年级学生通常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 如果教师的知识储备少、国家认

同教学内容或教学方式不具有吸引力，就难以在学生群体中树立教师权威，学生不认可教师，国家认同教育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他们的价值观开始受社会舆论、网络媒体、文化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在缺乏法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基本素养的情况下，学生极易受到负面舆论的影响，此时开展国家认同教育就会面临更多外在因素干扰。

（二）建议与启示

第一，关注香港学生的个体价值，鼓励他们到内地研学或就读，引导他们将个人发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的潮流中，增强其建设祖国的意识和自信。

香港中小学生在个体价值维度得分最低，这说明香港中小學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与祖国发展的密切联系。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鼓励香港中小學生到内地研学实践，开展“走读粤港澳大湾区”“走读内地”等活动；结合语文、历史和思政课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香港中小學生到大湾区体验，或到内地的香港子弟校、子弟班就读以及交换学习等，促进香港中小學生深入了解内地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引导学生用实际行动参与大湾区建设，增强他们建设祖国的意识和自信。研究表明，“他者”的存在对于提升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倾向于将自我归属的群体与不如自己的“他者”群体进行比较，这种“利我比较”能够带来一种优越感、一种自我肯定。^[21]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港人子弟到内地参观、学习，学校借此可以加大宣传我国在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力量、体育与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利用“他者”引导学生产生“利我比较”，提升国家认同。比如，为到内地就读的学生开设“特色国学体验”专题课程，让他们亲身参与、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排爱国企业家、发明家、奥运冠军、宇航员等杰出人物与香港学生面对面交流和互动。这些活动能够使香港中小學生对国家的经济、科技、体育等各方面的巨大发展成就产生深刻印象，在“利我比较”心理的推动下，提升国家认同。由于香港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制度安排，香港的民族文化属

性与政治认同之间缺乏黏合作用。^[22]要真正提升香港中小學生的国家认同，不能仅仅依靠历史文化层面的情感联结，还需要立足祖国现代化发展，着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协作融合真正带动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构建。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持续的长期交流项目，引导香港中小學生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实力和区域竞争力，鼓励和支持香港青少年以内地城市为“家”，将个人发展融入大湾区城市发展的潮流之中，用实际行动参与湾区建设，切实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第二，加强对香港教师的爱国教育培训，聚焦国家认同教育目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尤其要关注年级差异，优化爱国主义教学方式，提高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相关调查发现，香港教师对国民教育的目标、内容的看法及其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香港的国民教育的前进方向。^[23]教师是培育学生国家认同的主力军，香港教师的政治立场及专业素养是影响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在香港，很多中小学仅有1—2位专业历史教师，大部分中小学是由中文科教师或其他学科的教师来兼任思政类科目。^[24]受专业知识、教学能力以及个人政治站位所限，这些教师在解读教学内容时容易产生偏颇，导致大量关于内地的片面甚至不实信息在课堂上传播。鉴于此，必须深化香港教师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香港教师国家认同教育培训。例如，可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开展教师教学观摩，安排香港思政科目教师观摩内地中小学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的教学，实地考察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各学科教学的形式，提升香港教师国家认同教育素养。本次调查发现，“年级”这一维度对香港中小學生的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对此，香港教师要深入了解不同年级学生对国家发展的学习需求，结合时事热点、生活事例等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香港中小學生对内地发展的认知与了解。在教学方式上，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不同，教师要结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采用恰当的教学策略。例如，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此时国家认同教育可以围绕启蒙性学习展开，通过升国旗、唱国歌、讲革

命故事等方式，让爱国主义情感在学生心底萌芽；初中生的认知处于由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阶段，但是他们的辨别能力还不强，很容易受负面舆论影响，此时教师可以采取沉浸式、体验式等教学方式，通过实地考察、社会服务、研学实践等方式增强初中生对国家的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价值观引导，打牢其思想基础。

第三，发挥母亲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家校协同，优化国家认同教育的家庭环境。

家庭是国家认同教育的微环境，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母亲的文化水平对学生的个体价值有显著影响。类似研究也指出，父母亲的国籍、父母亲的文化水平会对澳门学生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影响。^[20]家庭教育是落实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一环，香港中小学应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例如，通过开发家庭教育微课，举办“我的家在中国”“我的祖国”等爱国主题活动，把家长引导为国家认同教育的一支有生力量，发挥家庭在香港中小学生学习国家认同中的促进作用。在国家认同教育上，母亲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有研究指出，家庭的教养方式会影响青少年的政治价值观，母亲温暖的教养方式能够促进孩子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如果孩子与母亲的交流方式充满爱、温暖以及民主，则他们日后会对政治人物、政治机构等政治象征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倾向。^[25]面对复杂的社会发展要求，母亲自身不仅要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还要关注孩子思想道德品质和政治立场等的培养，把孩子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品德修养、健康人格的形成放在成才标准的第一位。具体而论，母亲可以带领孩子赴内地研学、到红色教育基地旅游、与孩子一起观看爱国主题电影，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创设民主的家庭环境，如让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鼓励孩子参与爱国实践活动，在民主交流的过程中帮助孩子逐渐建立正确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和法治观念。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势必会连带形成积极的爱国整体氛围，系统提升香港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

参考文献：

- [1] 贺金瑞，燕继荣. 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1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EB/OL]. (2020-07-01) [2023-03-10].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7/01/content_5523060.htm.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8.
- [4] 涂敏霞，王建佑，萧婉玲，等. 港澳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 [J]. 青年探索，2014（2）：27-33.
- [5] 沈本秋. 观念挑战与制度短缺：港人的国家认同建构之困：以香港国民教育问题为例 [J]. 科学社会主义，2016（5）：137-142.
- [6] 郝诗楠. 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与展望：基于港台海外学术成果的分析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37-44.
- [7] KEVIN TZE-WAI WONG, VITOR ZHENG AND PO-SAN WAN. Local versus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1998—2017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20（5）：803-827.
- [8] 郭艳，徐博东. 回归前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迁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57-61.
- [9] 郑宏泰，尹宝珊. 香港本土意识初探：身分认同的社经与政治视角 [J]. 港澳研究，2014（3）：66-78.
- [10] HO-YING FU, SAU-LAI LEE, CHI-YUE CHIU, et al. Setting the frame of mind for social ident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9（2）：199-214.
- [11] YING-YI HONG, HSIN-YA LIAO, GLORIA CHAN, et al. Temporal causal links between outgroup attitudes and 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 1997 transition [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06（2）：265-288.
- [12] FRANCIS L. F. LEE.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reality in the adoption of postmaterial valu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J].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8（2）：139-148.
- [13] 张萌萌. 香港政治传播中的认同构建 [J]. 探索与争鸣，2012（6）：78-80.
- [14] 康玉梅. “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民教育与国家认同 [J]. 环球法律评论，2018（2）：165-177.

- [15] 杨哈旭, 徐海波. “他者即恶”: 香港青年社会运动与国家认同的流变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2): 11-15.
- [16]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 SPSS 操作与应用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 244, 201.
- [17] 陈杰. 香港回归以来港人“国家认同教育”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1 (3): 38-46.
- [18] 大公报. 教界倡特定课时授基本法 [EB/OL]. (2015-04-30)[2023-03-28]. <https://www.tkw.com.hk/epaper/view/newsDetail/1362692967860670464.html>.
- [19] 李臣之, 梁舒婷, 郭晓明. “品德与公民”课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国家认同: 基于澳门中小学生的实证调查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2 (2): 57-70.
- [20] 朱琳. 小学生课堂学习体验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25.
- [21] 庞琴, 蒋帆. “他者”在香港青年大学生国家认同感中的作用: 北京香港两地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实证比较研究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6): 147-158.
- [22] 傅承哲, 杨爱平. 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心理融合机制 [J]. 当代青年研究, 2018 (6): 117-122.
- [23] ERIC KING-MAN CHONG, JUN HU, ERIC CHI-KEUNG CHENG, et al. Handling national controversy on the education frontline: perceptions of Hong Kong teachers on the pedagogies for national education [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22 (4): 387-405.
- [24] 余晖, 王晓芳, 闫赵凌云. 香港教师国家认同培育的现实挑战与“湾区方案” [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2 (2): 1-9.
- [25] 郭素然, 吕少博. 母亲情感温暖对青少年政治符号态度的作用机制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 (7): 1082-1087.

(责任编辑: 李 洁)

Empirical Research on National Ident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Li Chenzhi, Zheng Han, Liang Shuting, Huang Jingro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1239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the level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has improved, but the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value can still be improved. Some students do not deeply realize their connection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national value and sense of sharing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Th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de, mother's nationality and place of study and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seven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surve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udents study in the mainland, China, or study in children's schools or class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guide them to integrate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and the Greater Bay Area, so as to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and confid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therl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atriotic educational training for teachers in Hong Kong, focus o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al objectives, enrich teaching content, optimize teaching methods and lay a solid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We should also shed light on the role of mothers i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and optimize the family environmen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so as to systematically improv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level.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ome-school coordination